

# 1 导论

20 世纪即将结束，在展望新世纪之际，人们不禁要回顾过去。近百年的沧桑变化，中国农村变化最为剧烈，比过去几个世纪的变化还要显著，特别是 70 年代末以来的 20 年间，中国农村各地的变革此起彼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为世界所瞩目。1978 年底，正当全国各地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之际，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小岗村农民按手印“秘密协定”地实行了包干到户<sup>①</sup>。这一壮举为农村全面深刻的改革拉开了序幕，并给城市改革以重要启示。几经挫折终于在 80 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中坚力量，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邓小平曾经说过，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是农民创造的“两个意想不到”。实际上，中国农民创造了一系列“意想不到”。从农村自由买卖的集市到专业市场，农民个体商贩走南闯北，从走街串巷到城镇摆摊设店，带动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积极开拓商品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神话”。1982 年，河南省密县一些农民为了实现规模经营，采取了资金、实物、

关于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小岗生产队秘密“包干到户”的历史事件，媒介的报道及研究报告较多。1998 年恰逢改革开放 20 周年纪念日，不少报纸杂志登载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回顾文章。可参阅广州：《南方日报》1998 年 12 月 18 日：“小岗村‘大包干红手印’揭秘”。

劳务和技术等联合的方式，开创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制度。1983年7月，深圳市宝安县农民首先实行“股份制”并冲破了“禁区”，使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在宝安集团问世，开创了中国特色股份制的先河（王天义等，1997）。1983年，浙江省温州龙港农民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开始了中国农村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龚益鸣，1994）。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内地走向沿海的“民工潮”，发起了中国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并冲击僵化的“户籍制度”。1991年，吉林省梨树县平安村推行了无固定候选人的民主“海选”制，开创了农村社区真正村民自治的政治民主<sup>①</sup>。如此这般的革新举动此起彼伏，在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堪称“首创”。每次“首创”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中国农村社区总体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些“首创”的历史功绩在人们认识中总是被“农民愚昧落后”的偏见所淹没，比较少正视农民的“首创”意识及其在中国农村变迁和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的意义。在一些政策性文件和对策报告中，总是呼吁要加强农民教育，强化农村的控制和管理等，这些“教训口气”、“控制措施”和“管理方法”等总是难以被农民接受。大多数农村社区仍然没有因为这些决策而改变。山东省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本伦（第一位硕士书记）“败走麦城”的例子说明农村的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仅凭理想和热情是不够

① 于克，张彬彬，“海选：谁来执掌村中大权——一场黑土地上的村民自治‘大潮’”广州：《南方周末》1995年7月12日第1版。

的<sup>①</sup>。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它内在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它能产生无数的历史性“首创”，必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土壤”环境。这是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中国农村变迁的地域空间来看，如今的农村和农民已非昔日可比。一些地方“万元户”已经十分普遍，早已流行“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才算富”的民谚。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亿元村”不断涌现。一批批富裕的现代化农村社区不断崛起，天津的大邱庄、江阴的华西村、深圳的万丰村、河南的临颖县南街村，等等，这些被称为“乡村都市”的社区，已刷新人们心目中农村的概念。但是，在中国农村九亿多居民中，仍有 5000 万多人处于贫困线以下<sup>②</sup>。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 218 万个农村社区，仍有 28.5% 属于贫困型，集体年收入不到 1 万元，中国还有 7 万个农村社区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他们处于更贫困的境况，甚至“吃不饱，穿不暖”威胁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徐有生，1995）。面对这样的地区差异，不禁要问其原因是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各地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状况相差不大，在 20 年的时间里，有的社区为什么能迅速

许志杰等：“硕士支书泪别乡土”广州：《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7日第13版报道：杨本伦，198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1989年8月~1992年10月在国家人事部工作，1992年10月~1998年4月辞去国家人事部工作，回到老家出生地——山东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成为我国第一个硕士村支书。杨本伦对一个村庄社区充满了热情，他的理想是了解农村，改造农村，带领父老乡亲致富，但现实逼他无可奈何地辞职。

在关锐捷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河北科技出版社1998年）中，“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践与探索”（第347~362页）：1986年，国家统计局测算的农村居民贫困线为年均纯收入低于206元，1996年调整为580元，1997年按此标准确定的贫困人口5000万人。

富裕起来，有的则停滞不前甚至愈加贫困呢？贫困落后的社区是否可以借鉴富裕社区的先进经验来改善其现状？这些先进经验是“真经”吗？在方法上采取“照搬”还是进行根本意义上的“创新”，通俗地比喻为“输血”还是“造血”的问题。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血”到底指什么？是资金、技术、人才、知识及信息、制度及政策，还是几种要素的不同复合体？抑或是别的什么？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上述一系列问题一直吸引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者的关注和探讨。社会学特别是社会人类学从时间维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某一个地区或社区为什么呈现目前的状况，是因为这个区域的一些历史原因造成。在社会学家眼里，不同地区或社区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态，是由于社区风俗、习惯、文化状态不同所致，这些差异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引起的，历史上的差异是更前的历史所造成。其逻辑公式是“现状不同是因为历史不同”，落入循环论证。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近百年史是西方经济和文化势力破坏中国乡村的历史（吴怀连，1998）。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群体及社会的制度、社会分化等问题的学科。社会学特别是人类社会学比较专注于该社区过去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旨在说明不同人群的差异，一是从正史书籍、野史佚事、地方志等文史典籍或文学作品中去追溯历史状态，注重于社区变迁的表象特征；二是从当代社区群落中，搜集风俗习

惯、文化现象、民间故事及传说等历史遗产推断历史状态。社会学把社区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丁元竹，1991），通过社区研究探索社会历史趋势及规律。在社区研究方面，社会学侧重于群体的总体特征、内部结构以及相应关系，并能以家庭、家族为立足点研究个人行为，能对个体之间的角色、地位和互动行为进行详尽的描述，但并不深入其中本质原因。所以，社会学并不能真正揭示出不同地区或不同社区间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实质。

政治学在对待不同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时，主要从群众集体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个人行为的控制、社区生产和生活的治理等方面进行考察，侧重于社区政治结构、权力结构、政治参与、政治组织及权力运行机制等研究。在政治学里，首先是把社区当作政治活动的基本场所和基本单元，探索社区政权组织及其社区公共权力对社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作用（王振海 王存慧，1995）。但忽视了政权之外的政治、经济、非物质利益关系的作用。其次，采取了民主、法制等形式，保护社区里个人利益，但忽视了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差异，比较注重同阶层内的共同利益和社区间的利益差异。再次，主张社区政府权力强弱导致了社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如果一个社区的政府权力机构的管理能力、控制能力、治理能力强，那个社区就处于良性运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状态。政治学把社区里个人分成不同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利益，国家和政府就是调和各阶层利益的机器。所以，在政治领域，军队、政党、法律和制度等这些都是为调和

不同阶层利益而安排的机制。毛泽东把农村居民分成若干阶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游民和雇农等，并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革命的本质认识。当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和失控时，就会发生革命，从而重新产生利益调和机制。但是，毛泽东把这种政治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农村人口划分为若干个阶级成份，并开展“阶级斗争”，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失误（薄一波，1993）。可见，政治学在研究社区问题时存在着片面和缺陷。

经济学对社区的研究，在发展经济学里有比较多的研究。发展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比社区范围大并且由若干社区组成的“区域”。重点考察在一定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等外部环境中，某一个地区如何聚集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如何开发土地资源，实现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商业及其他第三产业的转移，即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关注的问题，研究资源在不同部门或不同产业间的配置情况，强调区域功能的合理布局（李小云，1995）。与社会学、政治学相比，发展经济学比较重视社区的差异研究，主要研究落后的或欠发达（一般用中性词“发展中” Developing）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其次研究发达（Developed）国家如何维持增长和发展。但更多地注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加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目的在于不断缩小“发展中”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谭崇台，1989）。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第 1 版）第 22、24、131 页和《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第 37~38 页。

可见，发展经济学不重视社区及社区内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影响社区发展。

发展经济学对社区的研究视角，之所以存在不足，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潜在假定与实际不符：政府能够利用权力和制度把资源或要素合理地配置到不同的区域和各个产业中，从而实现落后区域快速发展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发展。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忽视了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时自身陷入“失效”状态。不难明白，发展经济学注重地区差异的描述，并从外部环境和资源状况去找原因，没有从更微观的个人、组织、企业、政府的利益差别中去找原因。实际上，政府是代表一部份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利益，并不完全考虑个人、组织及企业的根本利益；个人、组织及企业并不完全按政府的政策行事，把有限的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配置到合适的产业和空间中去。

新的发展经济学不断汲取理论经济学的新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如从制度经济学中汲取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发展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落后在于资本和技术投入不足和低效配置，是因为制度存在问题，制度不能激励人力资本“创造性”地配置要素，从而社会财富增加缓慢（张培刚，1992）。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即体制改革。70年代末以来各个发展中国家兴起“改革”的浪潮，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有不少改革失败的实例。毕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取得“成功”经验及其走过的道路中归纳出来的。在研究方法上，发展经济学仅仅引用了现代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和理论”，还有一些新方法、新理论并未涉及到。

现代经济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在改写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论上的创新大大增强了逻辑推理能力和解释能力，研究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所谓的“经济问题”，而是较多地进入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甚至全部问题。现代经济学以全新的新视角和逻辑方法分析人类的一切行为或人们的全部行为，无论个人的、家庭的、组织的、企业的和政府的行为等，都被纳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野里。

本研究就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诸多问题。把分散于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里的问题综合到经济学分析框架里，几乎是全方位地透视农村社区的过程、原因及机理，从而发现以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没有解释的新问题，从而提出有效解决新问题的对策。显而易见，本书的选题和研究带有较大的挑战性，一是现代经济学理论还不够成熟，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其方法论还在发展中，可资利用的文献比较有限，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待于形成，难以有效地分析农村社区的问题；二是对社区变迁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少，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文献。以往社区研究文献多是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方面的文献，可以继承的方法和理论比较少；三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村社区的动态研究，需要把分散在政治学、社会学、发展经济学里的内容和问题综合起来，寻求经济学分析的线索是一项开创性工作，而且分析问题的切入点、立场或聚焦点是难以确定的。四是农村社区环境、主体及行为、及其所反映出的问题错综复杂。在农村社区里，自然环境、个人及家庭、组织、企业、政府都是研究的对象，但是分析的基点和侧重点不同要求不同分析思路，按不同

逻辑思路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社区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事物，表现为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伦理的现象等，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难以自圆其说，这是本研究面临的挑战。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书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村社区进行研究，总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动态地考察农村社区的变迁过程，具体运用案例（case）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的方法体系。本研究借鉴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对农村社区进行经济学研究。社区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学方法，通过对单个社区的个案研究归纳出整个社会的一般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在多种可供选择的目标之间分配具备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从而满足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多目标需要。这里稀缺资源与需求的配置和选择几乎包含了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人们总是选择最能满足欲望和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当前的和未来的）的行动，即效用最大化或行为（函数）最大化。因此，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法，即人们总是比较各种选择行为的耗费（付出）和效用（收益），追求尽可能小的成本和尽可能大的收益。一定社会团体，如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企业等就是人们为实现自利最大化而组成的社会组织。社区就是由单个人组成的介于单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基本单位。本书把社区当作一个组织体，展开社区变迁的研究。所以，社区变迁的经济学研究方

法包括组织理论以及分析社区个人及群体行为的其他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企业理论等。

(2) 实证研究方法体系。本书选择中国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农村变迁过程及其机理。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一是社区研究，二是动态研究。

在社区研究方面，采取案例或个案研究的方法。中国大约有 370 万个村庄（自然村）社区（徐有生，1995），平均每个社区大约有 250 个居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个社区进行研究，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社区进行研究。社区研究是相对于地区研究、区域研究或国家而言，是指狭义上的较小地理范围的人群共同体的研究。社区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实证性，力求多角度、动态地考察社区各种现象和问题，分析其存在的根本原因。通过个别研究即“解剖麻雀”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运用已有的理论，从总体上总结农村社区变迁的规律；另一方面对照农村社区实际问题或历史事实，从中抽象和概括出一般理论，并检验、发展已有的社区理论。这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到被研究的对象中参与观察和访谈调查，即费孝通的体察方法，详细地收集有关社区的各方面资料，包括本社区内部及其相联系的外部有关资料。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的实地研究方法，被称为田野调查或实地考察（field work），实际上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策略（张新梅，1992）。

在动态研究方面，主要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20 年时间农村社区变迁过程。本项研究在改革和变迁较快的珠江三角洲选择个案，这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和搜集较多包含社区变迁过程和现象的资料。因为 10 年完成的变迁与 50 年完成同样

内容的变迁相比，透出的信息比较密集，观察和访谈调查的难度比较小，而且收集的信息比较全面。在珠江三角洲，挑选了北滘镇、石牌村和横岗镇等三个典型社区作为案例。北滘镇社区从某种意义上属于纯农田社区，靠社区内生成的乡镇工业促进社区变迁，工业化是该社区的显著特征。珠江三角洲的大多数农村社区属于这种类型。石牌村位于广州市东郊，现已成为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天河城区的一部分。都市的扩散带来的城郊社区城市化属于另一个类型的社区变迁，是社区研究比较关注的典型社区。横岗镇与香港、深圳相邻，香港属于国际经济中心，深圳是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后，深圳作为开放的经济特区，特殊的政策促使具有特殊区位的横岗迅速与香港和国际市场接轨，横岗社区变迁的速度快，变迁的程度深，属于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全面的综合的变迁类型，其中的制度变迁具有显著特征。通过这三种类型社区变迁的剖析，可以直接抽象、概括出一般理论，归纳和总结出农村社区变迁的普遍规律，不仅具有借鉴意义，用于指导珠江三角洲其他社区变迁的理论研究，而且可以用于推断中国农村其他社区缓慢变迁过程及其规律性。其研究过程取得的经验和研究方法还可以用以指导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进一步研究。

(3) 研究思路。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以现代经济学的组织理论作为方法，以社区组织作为分析单位，立足于社区，以社区成员即个人及农户行为为分析切入点，把社区内组织，包括农户、社会团体、企业、政府等纳入分析框架。社区是个体之间行为关系展开的场所，并且延伸至整个社会。与社区相联系的外部环境，即中国农村改革宏观背景也是研究的内容。中国农村 20 年的变迁看似在社会祥和安定环境中发生，但其内涵

比在 20 世纪前 80 年社会动荡环境中发生的变迁更深刻。对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记录文献比较丰富，比较有助于 20 年农村社区变迁的总体描述，这不仅为农村社区的微观研究提供背景，而且为社区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个案资料。因此，还必须通过农村社区微观考察和宏观研究，展示出农村社区变迁的基本趋势，为农村社区变迁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

### 1.3 本书结构与内容安排

本书的研究思路体现在本书的基本结构中，基本方法体现在研究内容中。本书的逻辑思路是这样：首先，展示农村社区变迁的分析框架、理论基础、方法论体系；其次，运用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村社区变迁进行实证分析；再次，基于前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论而进行的政策研究。本书内容共分十二章，粗略地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研究，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内容；下篇为实证分析，包括第五章至第十二章的内容。具体而言，除第一章导论外，第二章是关于农村社区变迁的基本概念及其经济学涵义，是本项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章阐述农村社区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重在对其研究文献的评价，并初步描述了农村社区变迁的经济学视野。第四章是构建本项研究的分析框架。一是展示社区研究的经济学方法，重在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分析方法及其基本的理论框架；二是阐述这一理论框架的具体内容即社区主体功能特征及其社区变迁内容；三是农村社区变迁的实质和机理。第五章是中国农村社区变迁过程的宏观考察，运用第四章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高

度抽象地概括过去 20 年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路径、主要内容及机理。第六、七、八、九章是农村社区变迁的微观研究，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村社区变迁的机理及其不同表现，在珠江三角洲选择具有代表意义的北滘、石牌、横岗等三种社区类型作为案例，对它们进行实证分析，旨在说明农村社区的共性及其与环境的相容性。这三个社区的变迁各有特点，但其共性显示出社区变迁的微观机理，正好是对第五章宏观机理的补充和注释。第十章是对其前三章三个案例研究的概括，主要通过对比北滘、石牌、横岗等三个案例的比较和归纳。第十一章是对第二至第十章内容的总结，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中揭示农村社区变迁的基本趋势和政策含义，以期指导农村社区变迁的进一步实践。第十二章归纳了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并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总结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另一方面指出本项研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及有待完善的地方和理论前景。

## 2 农村社区变迁的经济学实质

从字面上来看，变迁（changes）是一个时序上的词语，就是指事物变化发展的情况或者时间上的阶段转移。这个词语使用广泛，从大众化的用语到专业化的学术研究都在使用它，比如时代变迁，社会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等。本书把“变迁”用来说明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阶段转移。社会变迁是指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泛指一切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过程和结果。农村社区变迁属于社会的局部变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部分。这是因为农村社区人口约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搞清农村社区变迁的问题也就弄清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要真正把握农村社区变迁这样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就必须具体分析其内在实质、变迁机理或规律等。

## 2.1 农村社区的界定

### 2.1.1 社区的内涵与外延

#### 2.1.1.1 社区的内涵

“社区”一词早已存在。随着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特有“单位”（unit）概念的逐渐淡化，产生了工业小区和居住小区等等一系列专门的社区。

“社区”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常用语，诸如社区化住宅、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医院等已在街头和报刊中大量出现。这是作为一般意义的应用，把“社区”当作多人共同生活的地方，作为一种空间界限，表明我们与其他人、其他地方的关系，有时也表明一种利益关系，一种情感归属。

社区的定义存在多种观点，但是，基本涵义离不开自然区域和社会活动范围（将在第三章讨论）。丁志铭（1996）的一个综述性定义阐释了社区基本内涵：

社区是一个具备相对完整的社会功能，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社会。在这样的地域社会中，由于人们共享同一的生活环境和社区服务，加上不同程度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联结，居民形成了共同的社区意识与心理认同感。

在这里，“社会功能相对完整”是“社区”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本书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在研究中超越了行政社区大小的界限，所选的北溜社区和横岗社区是由若干行政村构成的镇社区，石牌社区是由多个自然村构成的村庄社区。这尽管与行政社区界限重叠，但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功能完整性的要求。它们都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具有相对不可分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地域单元上的居民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念、归属感、理想目标、生活方式等。所以，社区是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人文区域共同体。

### 2.1.1.2 社区概念的外延辨析

为了使“社区”的概念更清晰，有必要把社区与其含义相近的邻里、社区、社团、区域等术语区别开来。

(1) 社区与邻里 (vicinity)。“邻”是指接近住处的周围小区，“里”是指民众聚居之名，民国时期各地和现在的台湾，“里”作为最小的政府组织，以户籍为基础划分的行政单位 (徐震，1985)。“邻里”就是住处附近的较小单元或住宅小区，如农村里一个院落和自然村庄、城市里的街道小区。邻里在规模上小于社区，并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因此，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单位，仅作一个“面对面”的社会团体，即熟人群体。社区是一个比邻里稍大的地域空间单位，能满足区内住户日常生活的需求，可以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单位，社区里的居民一般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归属感、理想目标、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等。虽然城市的一些居住

区也被称为“社区”，但不具有社区这种性质，是因为那里的居民种族背景、职业、文化素质、心理及观念、生活方式等都是不同的，较少有共同的信仰、理想的社区目标和归属感等。所以，城市里居住区不是一个“社区”，只能当作一个邻里单位，或一个群体单位。这就是美国学者沃斯和威尔曼（L. Wirth, 1938; Wellman, 1979）总结的城市“社区”消失论的观点。

(2) 社区与社团。对于社区与社团的区别，德国学者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已经区别开了。他把人类组织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 *gemeinschaft*，即社区，是一种礼俗社会；另一类为 *gesellschaft*，即社会，是一种法礼社会，实质上就是“社团”。从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可以查到这两个词的解释，可以看到社区与社团的大致区别<sup>①</sup>。社团是出于相当理性意愿结合而成的，具有人口混杂、价值体系不同、人际关系的契约性、自我私利较重等特点，通常由协商、公众舆论、契约及法律等来连结。城市社会多属此种社团。社区则是人们出于相当自然意愿结合而成的，具有血缘和亲缘性、地域性或邻里性、友善与合作、共同的价值体系、经济自给自足等特征。农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社区性。

(3) 社区与区域（*region*）。社会学家把社区、区域及国家放在一个功能体系中进行区分，把国家分为区域，区域再分为社区，社区处于最低级水平（L. J. Cary, 1970）。丁元竹（1995）对此阐述：第一，从空间规模来看，区域是指一种在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The English - Chinese Dictionary*）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版，第 716, 722 页。